

一个人的村庄

大兴安岭密林深处，一个远离喧嚣的村庄；中俄界河黑龙江畔，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。因为这个村庄，老人得以生存；因为这位老人，村庄能够延续。青山绿水，人与村默默相守，一个人的村庄，人在，村在……

扫二维码 了解更多



2018年5月11日，老人在查看渔网，有空就去江边打鱼。

摄影：本报记者何山



本报记者李凤双、管建涛、王建

一路向北

从哈尔滨一路向北，驱车六七百公里，进入大兴安岭林区。作为我国最北林区，这里曾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木材，很多村庄因此而兴。在崇山峻岭间穿梭，车窗外闪过数不尽的白桦林、樟子松……从国道转入省道，越向深处，道路越难走，水泥路变成砂石路，又变成土道。在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开库康乡路口向北转，到达中俄边境，此地距离哈尔滨已达1000多公里。

塔河县位于黑龙江省北部，西接“中国北极”漠河县，北以黑龙江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。转出森林的那一刻，视野豁然开阔。一片湿地被水草包围，叫不出名字的黑白色水鸟，贴着水面振翅而飞。驶出湿地是一片开阔地，几个略显破旧的木刻楞房子，孤零零地矗立着，一眼能望到村边。这就是最早的“一个人的村庄”。距离中俄界河黑龙江不足200米远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。后来，随着撤并村屯，这里被合并到开库康乡开库康村，变成一个自然屯。只是由于历史悠久，当地人仍习惯称为“一个人的村庄”。村里房子七八间，但常驻人口只有一人。因此，这里被称为“一个人的村庄”。

这个人叫王凤萍，山东聊城人，今年已70岁了。头发花白，小眼睛，腰板很直。脸色泛黑，像很多常年干农活的农民一样。牙掉没了，但说话清晰，有些山东口音。

大约50年前，老人和她爱人，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省依安县“讨生活”。当年以及更早些，很多像老两口一样的人，从山东、河北等地跋山涉水到东北谋生，形成了“闯关东”现象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民潮之一。“那会儿，我们挺困难的。”老人讲，老家经常闹灾荒。

到了依安，老人的日子好些了，但种地打粮少，不是淹了就是旱，“还是吃不饱饭”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夫妻俩带着还不会爬的女儿，继续向北迁徙，来到中俄边境的“一个人的村庄”，“投亲戚”“找生路”。

早在夫妻俩到依安县之前，老伴的大伯家已经从山东来到“一个人的村庄”生活了。“在依安，种地要是收了，就啥也没有了。”老人自言自语，“这个地方比依安好过，能拉木头，能打鱼，容易活下去”。

对老人来说，土地营子村代表一种重生，这里给了全家第二次活下去的机会。

一村到一人

土地营子村户数最多时有30多户。老人和老伴上学不多，但干活都是好手。在生产队种地、拉木头、打鱼，农村的活都会干。那些年，老人一家的日子还过得去，大人干活、小孩上学，一家人“能吃饱饭”。勤劳的双手支撑起这个家庭。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，慢慢长大。

土地营子村紧靠黑龙江，人与江，整体上算相安无事。

偶尔发生的凌汛，虽然给村里人带来一些烦恼，但没什么大问题。每到初春，冰冻了一整个冬季的江水开始融化。有时上游化得快些，下游化得慢，初融的冰块就会顺江而下，甚至冲出江面，冲到村里。

直到1984年黑龙江发生一场大洪水，冲毁了村里很多房子，村民们几十年攒下的家底顷刻间荡然无存。

缪淑秀

行走在有福之州，总能看到一株株绿荫如盖的榕树。

福州冠于榕城之称，由来已久。北宋文学家、地理学家乐史所撰的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：“榕……其大十围，凌冬不凋，郡城中独盛，故号榕城”。

在福州市杨桥西路与江滨西大道的交叉口，一座高3.8米的雕塑默默伫立在金牛山公园对面，雕像左手向上托起，右手荷锄，头顶榕树，仰望长空，仿佛托起一个绿色之城。

雕塑上的这位名人，便是宋代福州太守张伯玉。

张伯玉，宋真宗咸平六年(1003年)生于福建建安(今建瓯)。仁宗天圣二年(1024年)登进士第，后又登书判拔萃科，一生刚介有守，文才甚高，继胡瑗、王逢、张洎之后主持儒学。庆历四年(1044年)范仲淹以其敢言清节，向朝廷推荐，得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。嘉祐八年(1063年)四月，以度支部中知越州。宋治平二年(1065年)，62岁的张伯玉自越州知府任上移至福州。

如果没有1984年那场大水，这个村庄的历史也许会重新书写。

村里人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想法，被洪水动摇了。从那时开始，村里人开始陆续往外搬。“有小孩的，慢慢搬走了，原来一起在生产队干活的人，也都走了。”老人说，多数人都搬到距离江稍远的开库康乡所在地——开库康村。

此外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人口流动也出现新特点，很多人开始从偏远地区向中心乡村、中心城市等人口聚集区迁徙。

为了让孩子们过得更好，老人在开库康村盖了两个木刻楞房子。大儿子、二儿子结婚后，直接住在了开库康村的新房里。女儿结婚后也住在开库康村。

三个孩子都走了，但老人和老伴没离开这个村。哪怕是这个村的其他村民都搬走了，他们依然留了下来。

这些逐渐离开村的村民，老人已记不起哪户先走，哪户后走了。

老人抬头想了半天，也没想起来，哪年开始，老两口成为这个村庄唯一的常住户。

老人的房子距离江面不远。“发洪水时也都进来了，到脚脖子了。”老人说，房子地势比较高，才没被洪水冲毁。

房子保存下来，也是他们在村里生活下去的基础。

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老人和老伴打鱼，喂鸡，种菜，不富裕，但也恬淡。

直到2013年，老人老伴夜里突发心梗过世，平静再次被打破。

儿子、女儿们以为老人会搬离这里，到不远处的开库康村儿女家住。一来老人不会触景生情，二来也不会太孤单。

没想到的是，老人倔强地留了下来，直到现在。

一村人变成了一个人。一个人也是一村人了。

“够用就行”

尽管是一个人的村庄，老人也有自己的小院，用围栏围起了菜园子。

见到老人时，她正猫腰覆膜，种黄瓜和香瓜。“有这个园子，青菜就够吃了。”老人很喜欢自己的菜地，“秋天，再晒点干菜，茄子干、豆角干，备着冬天吃”。

老人饮食比较简单，平时自己蒸馒头吃。菜炖得时间长些，松软，容易嚼。

虽然一个人住，但院里不缺生气。三只母鸡，一只公鸡，在院子里外溜达，有时候还直接进屋。

养鸡，不是为了吃肉，而是为了下蛋。厨房一个小纸盒里装着20多个鸡蛋，都是这几只母鸡下的。“这些鸡蛋，平时就够我吃了，也不用买。”很多吃食，老人都能自给自足。

老人不喜欢扔东西，不少“破烂儿”都留着。几年都不穿的旧鞋，甚至用过的电池，都不舍得扔。

院子里有两块几十年前磨米用的圆形石磨，

如今早已不再用它磨米，但仍然留了下来。

在老人存放杂物的仓房里，东西摆放得不算整齐，但农村生活用的各种物件几乎都看得到。

“就在那放着吧，万一用时，扔了就没了。”老人觉得，放那也不碍事。

老人家里有60多亩地，都给儿女们种了，每个孩子20多亩。

儿女的日子越来越好，老人说起来特别骄傲，“两个儿子家，都有车了。大儿子是去年买的车，小儿子买得更早呢”。

老人收入不多，但“没啥病，一年也就吃两次治腿疼的药，花钱地方少”。

地，虽然给儿女种了，但老人每年能拿到地力补贴4000多元，仅这一项就超过了贫困和低保标准。

她不要儿女的钱。“我也花不了什么钱，就买点米面油，平时也不咋花钱。”老人对钱看得不重。

对于物质需要，老人觉得“够用就行”。

有个念想

刚进上地营子村，就能看到一个低矮的木刻楞房屋，几处倒塌的旧房。

木刻楞是以木头结构为主的房屋，老人就住在木刻楞里。为了保暖，老人的房子外面还抹上一层泥，屋内清晰可见露在外面的木头。

房子有些破旧，主屋有两扇窗户，玻璃已经没了，用塑料布遮挡着。看着虽旧，但挺结实。“1958年，这个房子就有了。”老人说，一直住到现在。

上地营子村纬度高，冬季极冷，房子结构比较特殊。为了防寒，屋里都建“火墙”。“火墙”中空，连着灶台。

冬天生火做饭、取暖，老人屋里的“火墙”也跟着热乎。

冬天，她并未感觉多冷。老人不舍得花钱，但该花的钱一定得花。日历是老人每年都买的东西。

虽然是一个人的生活，但老人时间观念很强。墙上挂着一本日历，日期正好撕到当天，5月12日。

“每天都看看日子，什么节气了，该种什么了，什么时候能下江打鱼了，心里得有个数。”农历正月二十九，是老人的生日，“就是煮面条，吃鸡蛋”。老人对生日不太在意，说得轻描淡写。

“生日好过，日子难过。”老人口中极少流露出丝丝忧郁，“要是忙活点还好点，就是待着时候，没啥意思，会想一些亲人”。

屋里墙上挂着一个老相框，里面有10多张老照片，其中两张是老人的母亲。

母亲活到96岁。去世时是突发疾病，她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赶回山东看最后一眼。

去年是母亲去世三周年，老人自己回到山东老家拜祭。

一个几乎不开村的老人，她的闯荡超出想象：“我个人回去的，自己去车站买的票”。

老人在山东还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妹妹。家里一个泛黄的小笔记本上，歪歪扭扭地记着他们的电

话，“时间长了，就打电话，看看他们都好不好，就是有个念想”。

“我大哥，三个小子、两个姑娘；我二哥，四个小子、一个姑娘；我妹妹，两个小子，一个姑娘。”即便远隔数千公里，不常见面，老人依然清楚地记得老家人。

很多年前，老人的姐姐、姐夫，以及哥哥的孩子，来过上地营子。“最近一次山东老家亲戚来上地营子，是在五六年前，舅舅家的孩子来了。”大儿子刘守忠说。

听到了，也看到了，老家的日子比以前强，老人格外高兴，“家家都有车了，生活越来越好。”

“难事”不难

离王凤萍家不远，有一个林业管护站，隶属于大兴安岭林区塔河林业局二十二站林场。站里住着一对夫妻，是当地林业停伐后看护森林的职工。

姜德彬、钟丽华夫妻俩，夏季防火时候经常住在站里。冬季有时候回到场部生活。

儿女们找老人，有时会给这对夫妻打电话，夫妻俩帮着告诉老人一声，老人再给儿女们回话。

老人也有个手机，但村里没通电，充电不方便，所以老人的手机平时都是关机状态。

“有事了，我就给儿女们打电话。”老人说，挂完了就关机，省着点电。电没了，就让到江边打鱼、种地的老人，顺路带到乡里充电。

林业管护站有一个太阳能发电设备，发电不多，老人不愿意去“蹭电”。

屋里有个井，没有缸，装水的工具是一个废旧塑料桶。林业站夫妻用水，也到老人家里来取水，屋里的人气也多了。

虽然村里只有一个人，但儿女，以及一些村民的地还在上地营子村，他们经常来种地。

“种完地也不断人来，今天他来撒药，明天他来施肥。”老人说。

大儿子、二儿子家的农机具，就放在老人的院子周围。

“再早都是用牛、马种地，你看现在，一个人开着车就能种了，谁能想到现在这样种地啊。”老人感叹。

“孩子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，我就提前做好饭等着他们，他们来了就吃。”老人说，菜也简单，有时候是青菜，有时候是打的江鱼。

聊天的空，碰上从开库康村来上地营子村种地的大儿子刘守忠。

“我家有200多亩地，每年都种大豆。以前用牛马拉犁的时候，我妈种过地。等到都用机械种时，她就岁数大了，慢慢不种了。”刘守忠说。

晚上五点左右，大儿子把农机具放好，开着新买的皮卡车走了，老人继续一个人的生活。

对待生活，老人看似简单的无所谓，更像笑着看人生百味。

记者问：“羡慕很多人说说笑笑的生活吗？”老人答：“我就是瞎过，不眼气，不眼馋”。

记者问：“没碰见什么难事？”老人答：“难事都过来了，过来了就不算难

事。”

第三只耳朵

以前，老人家里有一只大黑狗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了。

去年，女儿又给她带来一只小白狗，长得虎头虎脑，经常在屋里凳子、桌子底下钻来钻去。

“它就是我的第三只耳朵，外面有一点动静，它就先叫起来。”老人说。

从来到这个家，这个小狗成了老人的小跟班。老人到哪，小狗就摇晃着小尾巴跟到哪。

只有一种时候，小狗不跟了，那就是老人到江里打鱼。

“打鱼时候，从家里出门，它就一直跟着我，看着我上船，都走老远了，它才回去，就在家等我。”老人自豪地笑。

“前几天下的挂网，昨天一看，有四斤多鱼。”老人脸上很得意，“这个江边就能养活我”。

“你要是来不来，我今天上午就去江里了，看看之前下的网又挂住鱼没。”对着记者，老人边说边笑。

老人的渔船不大，最多坐两个人。每次去打鱼，老人都自己划桨，往返需要小半天。鱼大了，多了，就把鱼捎到乡里卖掉。卖鱼的钱，先放到捎鱼人那，什么时候到村里，再给她带回来。她从不担心拿不回钱来。

“有时候也弄点自个吃。”老人自言自语，“你想吃个鱼，还能买去啊！”炖鱼，是老人喜欢的吃鱼方式。

70岁的老人，自己划船去江里打鱼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。打鱼，老人有几十年的经验。风大了，不下江，江上有一块冰排，也不下江。

老人打鱼的地方，是打了几十年的熟地儿，她不远远划，也不贪大鱼。

对老人来说，打鱼不仅是一种赚钱手段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“江一开，不去江里打鱼，就不知道干啥了。”老人说。

没事的时候，老人喜欢到江边走走，捡点江水冲下来的小树枝，晾干了，就可以生火做饭。

“离不开这条江了”。吃的，烧的，顺流而下的黑龙江江水给老人的生活注入流动的气息。

流去的岁月，流不尽的江水。江水见证了老人几十年生活方式的延续。

家人就在

和很多爱热闹的老人不一样，她喜欢安静、自主地生活。

“几个孩子都叫我去一起住，我不愿意去。”老人说，孩子们结婚时，就直接分开过了。你住在上儿子、女儿跟前，不随便”。

“自个过，想干啥干啥。”

想干啥干啥，这是一种自由；想不干啥就不干啥，也是一种自由。

“破破烂烂是个家，一个人也是一个家。”老人的字典里，家的定义与众不同。

“儿媳妇都挺好的，有时还给我买衣服、水果，手机没费时还给我充话费，但我太愿意过去。”老人说，“我要想去，哪个都让我去。”

大儿媳在附近林场打工。正值大兴安岭林区防火季节，大儿媳在一个防火检查点，负责看守一条进山的路。车尾排烟装置加了防火罩，符合进山条件的车，她才抬起栏杆放行。

这条路是通向土地营子村唯一的路，她也在给婆婆“守山门”。

她说，“老人比较犟，多次让她和我们一起去住，她就不来”。

老人一再强调，两个儿媳妇都是挺好的，但自己过，得劲儿。

土地营子村有闲置地方。最近两年冬天，女儿都到这个村里养牛，就住在老人家。

这时，老人就暂时搬到女儿家住，仍然是一个，相当于和女儿“换居”。只有春节时候，老人才跟儿女们在一起。“我去开库康村时，他们各家，都去看看，看看他们咋样了。”老人说。

等到江解冻，老人们喝到水，开春时候，老人就回到村里，正好开江打鱼。

“我妈打鱼上瘾，基本上隔一天就打一次。”刘守忠说。

“下网不能过界。”老人说，“对岸就是人家的地方。”

一个村屯就是一座哨所，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。开库康乡乡长周瑞峰说，老人临江而居，沿江打鱼，既是生活，也是戍边。

“大家”安稳，小家才能安居。最近几年黑龙江岸边的堤坝又加固了，老人的家更加安全了。

“我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”老人心中的家，无关岁月，无关新旧……

“只要家在这，我就得守着。”老人生活的家，是这里的山山水水，是这里的一草一木……

编户植榕 泽被千年

张伯玉是福州史料记载颁布政策鼓励市民植榕的第一人。为了推动植榕，张伯玉提倡户户植榕，种者奖励，并亲自带头在衙门前种植榕树。虽然史书中关于张伯玉编户植榕的记载不多，也找不到具体的奖惩措施，但站在郁郁葱葱的榕树下，享受着绿荫的庇护，亦可遥想当时满城植榕的热闹场面。

福州人工种植榕树始于唐宋时期，宋代王逢、蔡襄、程师孟、黄裳、梁克家主政福州时都曾倡导民众植榕，但张伯玉编户植榕则是以施行政令的方式发起，百姓也从中体会到官府的良苦用心。此后，榕树在福州大地上真正扎下了根。

治平年间(1064-1067)，郑獬曾向皇帝举荐张伯玉代替他任知制诰，未得批准，张伯玉最终官至司封郎中。神宗熙宁三年(1069年)病卒，享年66岁。

与王审知、林则徐、严复一同成为福州的城市雕塑，分别立在城区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。

在榕城子女的心中，榕树就是家，榕树在哪，家就在哪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福州常住人口口中，以“榕”为名字的就有4万多人。

森林公园内的一株榕树冠幅达到1300多平方米，可容纳十人于树下；省府路裴仙宫内的小叶榕玉树周长14.4米，需8个成年人方可合抱；马尾罗星塔公园内的榕树见证了马尾船政文化和马江海战；双抛合抱榕则被赋予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……寿岩榕、人字榕、龙墙榕、编网榕，榕树造型千姿百态，关于榕树的传说更是美丽动人，可谓是“一榕一景一传奇”。

如今，榕树不只是福州不可或缺的城市风景，其落地生根、四季常青、不畏寒暑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早已成为这座城市骨子里的品格，鼓舞着榕城子女开拓进取、奋发向上。

政声人去后，自有春风吹。纵使宋时的月光已远去千年，这位古代地方官的为民情怀依然如挺立于天地间的榕树，既是“绿色丰碑”，也是百姓心中的“无字丰碑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福州市委决定修建一批城市雕塑，打造城市形象，“编户植榕”的张伯玉